

九〇年代夏羣生《船月》中的对韩认识与叙述
— 20世纪中国作家的对韩认识与叙事变迁研究 (五) 1)

藤田梨那

目 录

- 序
- 一, 《船月》的叙述空间与主题
- 二, 《船月》的叙述特点
- 三, 作者与韩国的深层因缘
- 四, 《船月》的对韩认识与意义

序

進入90年代, 中國与韓半島之間發生了飛躍性的變化, 1992年中韓兩國正式建交, 實現了南北韓与中國的對等交流。中國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也為建交后的中韓交流全面打開了快車道的綠灯, 兩國學者的交流、經濟貿易的交流、中韓企業的提携、旅游事業等, 都呈現了快速、广大、火熱的發展局面。在這樣的社會形勢下, 中國的知識分子、作家們開始對韓國的文化、歷史發生興趣, 透過目前中韓的多方面交流, 把審視

1)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Korea Research Foundation Grant (KRF-2004-042-A00064) ”
本論文是以《20世紀中國作家的對韓認識与叙事變遷研究》為大主題的國際合作研究結果之第五。著者為 日本國土館大學文學部教授。

的目光轉向兩國之間塵封已久的歷史，試圖從中摸索到兩國之間更深遠的因緣脈搏。在文學創作上陸續有一些韓國題材的作品出現，如：理由的《浪迹萍踪》、肖鳳的《韓國之旅》、許道明的《木槿花的傳說》、孔慶東的《獨立韓秋》等一些散文作品。但在90年代末最令人醒目的作品可謂夏輦生的韓人題材三部作品——《船月》《虎步流亡》《回歸天堂》。

《船月》1)是一部描寫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金九結緣中國船娘的歷史小說；《虎步流亡》2)是記述作者自己家族的特殊經歷、作者與韓國人士的交流，交錯記述抗戰期間金九避難嘉興的流亡生活的紀實文學作品；《回歸天堂》3)也是一部記實文學作品，記述上海“虹口炸案”的韓國義士尹奉吉的故事。與前舉几篇散文不同的是夏輦生的韓人題材作品明顯地是以一個歷史主題為貫穿線，將近十年的實地調查結果立體地穿插到作品中，每一部作品都是有机的、整体性的文學敘述。

通觀五四以來的韓人題材的文學作品，單以南韓即韓國作為描寫對象的作品可謂皆无，當然從五四到建國這一段時期，韓半島還未被南北分斷，中國作家多以一個整体來看韓半島。建國以後特別是韓國戰爭以來，中國作家的視線一直集中在北韓——朝鮮。4)從政治方面來說，直到80年代為止，韓國一直都是一個被冷漠的對象，因此建國以後涉及韓半島的文學作品也就多限制在朝鮮。夏輦生的韓人題材作品是以中韓建交與中韓交流的熱浪為背景的第一次對韓國的正面敘述，故夏輦生榮有中國文壇以韓國抗日夏國斗争為題材進行長篇創作的第一人之稱。目前夏輦生的韓人題材作品已引起國際文壇的關注，《船月》韓語版在韓國受到了衆多讀者的歡迎，被譽為“一個中國作家填補了韓國文壇的空白”，還榮獲了韓國政府獎。在美國也受到了文壇的重視，被列入重点書目。

在90年代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大陸文學已呈現出作品的商品化、一次性消費化的時代現象。在這樣的浪潮中出現的夏輦生的韓人題材三部作品具有如何的文學意義和歷史意義？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對韓認識是怎樣的？敘述手法與以前的韓人題材作品有什麼不同？這些都是有待我們去認真討論的問題。本論文準備運用E·H·Carr等的歷史小說理論探討以上問題。

《船月》與《虎步流亡》是關聯極緊密的兩部作品，寫作時間在1998年末至1990年初，基本上是一氣呵成的。長篇歷史小說《船月》中的許多史實均根據《虎步流亡》中的實地調查的結果；《船月》描寫金九與中國船娘的深厚而悲壯的情緣；《虎步流亡》則塑造出獨立運動領袖金九的形象。故本論文先將研究對象限定在《船月》上，附帶論

及《虎步流亡》中与《船月》有內在關連的部分。對於《回歸天堂》將另行論述。

一、《船月》的敘述空間與主題

《船月》攏括的是30年代到40年代這一段歷史。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金九自1919年韓國三一獨立運動時逃亡到中國，在上海參與了韓國臨時政府的組建，並擔任了警務局長的重要職務。1932年1月他策劃了由李奉昌執行的暗殺日本天皇的東京事件。4月又策劃了由尹奉吉執行的上海虹口公園炸案，事後為了保護一般市民和僑民，金九發表了正式聲明，表明事件是由他親自指示的。於是日本軍開始瘋狂地搜捕金九，金九由上海轉移到嘉興避難。《船月》描寫了金九在嘉興避難的一段生活。《船月》以「引子」開首，接下來是10個章篇，結尾是「尾聲」和「作者補述」，最後加上「后記」。每一章的開頭引一段《漂在水上的日記》，以此作為一章的伏線和概括。《船月》的主題是什麼？筆者認為這部作品的主題就是一個“緣”——金九與朱愛寶的“緣”、金九與中國民眾的“緣”。

作者在「后記」中坦誠地道出了她的作品世界，她說：“恐怕，正是因為這種沒有退路的逼進，我以全身心的投入走進了歷史，走進了故事，走進了那一个个活生生的因緣聚散的生活，走進了一個無限慘烈而又無限壯美的悲劇……”几行文字便表明了作者已意識地走入她所面對的歷史。正象E·H·卡(Edward Hallett Carr)說的那樣：“歷史，是在人們將時間的流動不是做為自然的過程——四季的循環或人的一生活去看待，而是做為特殊的事件——人們意識地卷入進去，或能够主体性地予以各種影響的事件——的連鎖來考慮時才開始的。”⁵⁾她進入的是30年代中韓兩國人民之間的那段活生生的“因緣聚散”的歷史。「引子」中說：“世界上有一个不識字的女人，把她生命中最珍貴的一段經歷，寫成了日記。”這是女主人公朱愛寶用船櫓寫在水中的日記。「引子」最後說：“這日記最終，會流到那个唯一能看得見，聽得到，讀得着，而且又能讀懂的人身旁去嗎？”《漂在水中的日記》是一個象征，即意味着不被記象的歷史，這樣的歷史不能用眼去看，而只能用心去看，用意識去摸索。而能够看到它的人就是與這段歷史有緣的人。作者在「作者補述」中對「引子」作了解答。「作者補述」中極簡捷地概述了促使《船月》產生的

人与事的机缘，作者说：“由于特殊的因缘，我作为一名记者，自始至终参与了这段塵封往事的寻踪。”“偶尔有一天，我在三塔湾月光如銀的水面上，讀到了一个船娘漂在水上的日記，于是，就打撈起这么一个深埋在已逝歲月中的故事。”作者便是能够看到那个不被記述的歷史的人。「引子」「作者補述」「后記」已点明了《船月》的世界与主题，就是描寫朱愛宝与金九的因缘故事，及圍繞着他們的种种因缘聚散。而把這些因缘故事打撈起來的作者，又与這種种因缘有着“无法拒絕的緣分”。

有關朱愛宝与金九結情故事的史料來自金九的自傳《白凡逸志》。6)但我們翻開《白凡逸志》便可以發現那里對朱愛宝的記述是很零散、很簡捷的。朱愛宝的名字在「下篇」中出現了5次，其中前4次都是極平淡的記述，只有最后一處的敘述內容稍多，同時也夾雜了金九的一些感情。金九寫道：

離開南京時，我把朱愛宝遣返回她老家嘉興去了。深感後悔的是，那時只給了她一百元旅費。她只知道我是廣東人，服待我將近五年的時間，我和她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類似夫婦的感情。她照顧我實在功勞不小。當時，我認為一定會後會有期，所以除了車資外，沒有給她足夠的錢，真是遺憾之至。7)

從這段記述中，我們能够知道的是朱愛宝与金九相處的時間，兩人之間已產生近乎夫婦的感情。但朱愛宝是怎樣的女人？他們的感情是怎樣發展起來的？朱愛宝為金九作了些什么？這些疑問都不能從《白凡逸志》中得到解答。但盡管如此，《船月》的作者確實捉住了她的想像的線索。在《虎步流亡》中作者記述了她尋找朱愛宝的過程与結果。在嘉興，与金九有過接觸的人物，如褚輔成的后代陳國琛、孫永宝的儿子孫桂容等，都是經過作者努力的探尋被找到的。但朱愛宝的消息却仍然是不甚明了的，只知道她早已去世。但作者這時已下決心要將這埋沒在史實与史實之間的歷史打撈起來。她說：“朱愛宝手下那把大櫓一下一下深刻在我的心上。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用心去聆聽歷史的回聲，把這個普通但却偉大的女性寫在我的故事里。”8)這便是她寫作《船月》的動机。作者捉住的有關朱愛宝的線索是“類似夫婦的關係”与“船娘”。船娘、漂泊的船、船娘手中的櫓、河水，再加上超越感情、俯瞰一切的月，這便构成了作者的想像空間。

朱愛宝的人物設定是嘉興的一个船娘，朴實純厚，不識字，但却很相信命運。第一章開首的《漂在水上的日記》中，朱愛宝告白了自己心里一直惦记着的一件事：小時

候算命鳥爲她叼出來的一張印有船与月的紙牌，和算命小神仙說的“小姑娘有萍水相逢之命”那句話。“萍水相逢”就是一種緣分，預告着朱愛宝將直面于一个甘苦交加，波瀾悲壯的因緣聚散的命運。

朱愛宝与金九初逢是在1932年的初夏，這個時間設定很重要。這一年的4月29日，韓國義士尹奉吉按照金九的指示，在上海虹口公園趁日軍舉行“天長節”万人祝捷大會，向會場投了炸彈，當場炸死日軍總司令白川大將。“上海虹口炸案”發生后，日軍以60万大洋通緝捉拿金九。金九自傳《白凡逸志》的下篇中，尹奉吉的“上海虹口炸案”和李奉昌的“東京炸案”是重要的兩次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行動，對這兩個事件金九都作了詳細的記述。「上海虹口炸案」后，金九緊急避難到嘉興。在嘉興偶然与朱愛宝相遇，在朱愛宝的掩護下見到了帮助他避難的褚輔成。可見作者的時間選定是爲了將朱愛宝与金九的因緣故事安排在韓國志士勇敢抗日的背景之中的。

朱愛宝對金九的感情是在她掩護金九的艱難歲月中逐漸發展起來的。褚輔成儿媳難產時，金九作出的誠心誠意的幫助；在河中遇到大風浪時，金九對朱愛宝的關懷；在朱愛宝的船上日夜工作的金九；金九的那双明亮的眼睛……，這些都逐漸地沁潤着朱愛宝的心，使她開始感到自己与這個男人是不是前世有約？而促使她切實意識到她對金九的感情的契机也与尹奉吉、李奉昌的英勇行動有關連。《船月》第四章中有一段描寫金九得知李奉昌在日本被槍決的消息時的悲痛情景。他爲了吊念義士，絕食了一天，在夜里還爲義士舉杯祭奠，悲痛涕下。而這些都被朱愛宝看在眼里，她也暗地里爲義士們流了泪。朱愛宝讀着兩位義士的名字，她發現他們的名字中有一个相同的字，就是“奉”，奉獻的奉！金九教朱愛宝識字的時候，曾告訴她“別小看這麼一个字，那可是一顆赤誠的心啊！”“是一顆爲國家，爲民族，无私无畏徹底奉獻的心！”在金九的教導下，朱愛宝認識了“奉”這個字，還理解了這個字的分量。她還覺得張先生(金九)的名字里也一定有這個字。也就是說，她理解了李、尹二義士的赤誠之心，也理解了金九的赤誠之心。在她的心里，李、尹二人和金九都是好人，“好人帮好人，是天經地義的事。”自從那時開始她爲金九納的鞋底上就開出了一朵“紅燦燦的杜鵑花”。杜鵑花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朱愛宝對金九的愛情，也象征着愛國義士的赤誠的血与心。在這里，朱愛宝与金九初逢的時間設定的意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朱愛宝開始接触到金九的心灵世界，對金九奉獻之心的理解与感動，堅固了她對金九的信賴。

第6章以后“緣”“緣分”這樣的字眼頻繁出現。第6章里，黃簽中的詩“長弓在握萍水

月，雨辰有逢知心舟，莫惧天高寒月冷，只求因緣系紅繩。”正是回應了第1章開首《漂在水中的日記》中，算命小神仙說的“小姑娘有萍水相逢之命”的含意。金九也明了他們之間的緣分，但他的心情要比年輕的朱愛寶更複雜，更痛苦。第7章中他与朱愛寶圍繞“緣”的一場對話就証明了這一點。他們談到佛經中的緣字：

愛寶：“听我娘說，經里只有一个字。”

金九：“經里只有一个字？”

愛寶：“就是一个‘緣’字！”

金九：“是啊，你娘說出了博大精深的佛理。”

愛寶：“這個字，人人都有，但不是人人都看得見。”

金九：“是這樣，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見。”

愛寶：“不！我看見了！你也看見了！”

金九怔怔地望着愛寶那雙烏亮的眼睛，

愛寶：“我跟你冇緣！”

金九摟緊了她顫抖的肩膀，眼中的泪水在急速地匯集，他无限感慨地自語着：“緣啊……緣……國与國，乃緣；人与人，乃緣；心与心，乃緣……一切皆緣，而一切皆无緣！這，就是我金九至今還苦行在人間的緣故啊！”9)

對於緣分的理解，朱愛寶是直觀的，朴素的。但金九却不然，他雖然早已被朱愛寶火熱的心所打動，但他不能給朱愛寶一个正面的回答，這不僅是因爲兩人年齡的懸殊，更重要的是因爲金九肩負着拯救祖國的重任，爲了救國，他已經忍受了喪妻失子的痛苦，爲此，他不忍再連累別的女人；在避難中他不僅要隱姓掩名，還要保護韓國的逃難同胞。所以他考慮的緣，不只是人与人的緣，還有國与國的緣；緣也不只是善緣，還有惡緣；國与國的緣也不只是韓國与中國，在當時的國際局勢中，可以說韓國与日本正是迫在睫眉的惡緣。金九考慮的緣在高度和深度上顯然与朱愛寶不同。這里表現了金九做爲一个人的心理，對於愛情的感激、躊躇、矛盾和苦惱。“一切皆緣，而一切皆无緣！”這是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哲理，暗示了一切緣分聚散的必然性，也暗示了他們兩人的愛的悲壯結局。

朱愛寶在《漂在水上的日記》中寫到：

他認了這份緣。

他嘴上不說，但我看得出來，他心里有我。

我發誓，要爲他搖一辈子的船！

他笑了。可是，他含着眼泪，還搖着頭。我勿曉得，這是什麼意思。但只要他能笑，我就滿足了。10)

《船月》的作者讓朱愛寶選擇的就是這樣的愛。在《虎步流亡》中，作者夏輦生傾吐了她對朱愛寶的感佩，她說：“若不是金九先生在他的傳記中寫下了這些，恐怕已不會有人在時隔几十年之后再提到這個普通船娘的名字，朱愛寶——這個普通的嘉興船娘，曾經以其淳朴忠厚的情怀，給了金九先生一個漂泊而又安全的‘家’！……這個无怨无悔的女人，選擇的是無須表達的奉獻。”11)我們從這一段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夏輦生在《船月》中讓朱愛寶選擇的愛正是“無須表達的奉獻”，這樣的奉獻出自一顆赤誠的心，与李奉昌、尹奉吉所作的奉獻是同樣可貴的，作者在李、尹的奉獻的延長線上列入了朱愛寶的奉獻。這樣就將中韓兩國人民的心系在一起了。

《船月》用了“船”与“月”來象征朱愛寶与金九的因緣故事。文學作品中描寫船与月并不是新鮮的事情，早在唐代，李白、白居易等衆多詩人都有咏頌船与月的詩歌，多以“船”來象征无常的人世，用“月”來表示永恒，以這兩個象征物來寄托自己的各种情感。“船”与“月”已成爲中國古典美意識的代表。那么《船月》中的“船”与“月”具有怎樣的含意呢？2005年夏天，筆者有幸得到了采訪夏輦生女士的機會，交談中筆者提出了“船”与“月”的表現意象的問題，夏女士回答到：“‘月’高而遠，然下照水面，照着水中的‘船’，二者即遠离又溶合。船与月是一個永遠的悲劇。‘船’与‘月’的關照就是要表現出中國勞動婦女船娘的超語言的內心世界。”夏女士的回答爲我們理解這部作品提供了很重要的線索。《船月》中的“船”与“月”實際上是一個現實与超現實的既對立又溶合的意象世界。但作者的兩只脚始終踩在船上，踩在現實上。朱愛寶是一個社會底層的勞動婦女，她沒有高深的文化水平，只靠手中的櫓搖船生活。但她堅信緣分的存在，愿意一辈子爲金九搖船，好人帮好人，只要金九能笑，她就滿足了。作者刻意刻畫的就是這樣朴實厚厚的勞動民衆的形象。朱愛寶与金九終不能在現實中結成夫婦，但他們心与心的緣已結在一起。“船与月，相伴无語。”12)心心相映，無須語言表達。作品結尾中，“船”与“月”的溶合是在一種既优美又悲壯的意象世界中描繪出來的。朱愛寶得知金九遭暗殺，悲痛不已，她將一雙

双爲金九作好的布鞋送入水中，做爲對他的祭奠。此時，銀白的雪花紛紛落下，有似“月亮的碎片”，落入河中，照亮了水波，在“金色的波光”中，在鮮紅的无窮花中，走來了金九。作品中是這樣描繪這個場面的：

啊，是張先生！

她在心里歡呼：“我就知道你會回來的！”

他点着頭，笑容滿面：“你說過，爲我搖一輩子船。”

她飛奔着迎上前去……

无窮花盛開着。

月亮，又悄悄地升起。好圓！好亮！好大！13)

她與他的團圓不是在現實中，而是在超現實中，在他們的心灵中實現的。月亮的破碎，“天上的，水中的，還有她心里的，都碎了”；布鞋“小船”的祭奠，這本來都表示一種喪失感，一種絕望感，然而《船月》的境界却不是至此截止的，当月亮破碎，朱愛宝的心也破碎，碎片紛紛落入水中時，一個升華的意境展開在眼前，在這個意境中，他們的緣真正結合在一起了，圓滿的月亮象征着他們的團圓，向高空升華。但在這樣的團圓中，朱愛宝的心愿依然是“愿意爲張先生搖一輩子船”，而張先生（金九）終於答應了她。團圓雖是在超現實的世界中，但現實世界仍被溶合在其中。《船月》故事的既悲壯又美麗感染效果就是這樣釀造出來的。

我們可以說，朱愛宝與金九的結緣故事是在作者的虛構中完成的，但這個虛構又正是作品呈現的“敘述的真實”。作者所完成的是將事實的真實與敘述的真實揉和在一起的困難的工作。《白凡逸志》中有關朱愛宝的記述可以說是一個史實，但因為記述得過少，我們無法了解實際上她與金九的生活；而且除了《白凡逸志》，再沒有其他歷史書（正史）記述朱愛宝這樣一個太普通的女人了。從這一層來說，《白凡逸志》中有關朱愛宝的記述可謂一個“軼事”。金九筆下的几行文字，一方面確實点出了朱愛宝“忍辱負重而无怨无悔”的品格，使人難以忘懷。另一方面在他對朱愛宝的感激中也凸現了他做爲一個普通的人的情感。用《亞歷山大王傳》作者譜魯塔克的說法，這就是金九的“心灵的表現”。14)《船月》的切点就是這個“軼事”和“心灵的表現”。作者從這個切点進入想像與虛構的世界，選擇史料中的史實，配合上用十年的時間調查出來的事實、歷史人物，發揮

作者精練的筆力，拓展了金九在嘉興渡過的那段避難生活，描繪出了朱愛寶與金九悲壯而美麗的結緣故事，使人感到它跟史實一樣真實。唐納德·司班斯(Donald Spence) 曾對“敘述的真實”作了這樣的解釋：

敘述的真實可以定義為一個標準。這個標準是我們用來衡量什麼時候某個經驗被描述得令人滿意。敘述的真實依賴連續性、封閉性和各個部分所組成的美的終極。當我們說某某故事寫得好、某個解釋有說服力、某個迷案的解答肯定是真實的，我們所指的就是敘述的真實。某個特定的書寫一旦獲得敘述的真實，它跟其他的真實一樣可信。15)

作者夏輦生為了重述朱愛寶與金九那一段生活，選擇了一系列與他們有關的史實，首先將時間的開首設在1932年初夏，將尹奉吉的“上海虹口公園炸案”定為第一個史實，為作品布下了確實的歷史背景。作品中主要描寫朱愛寶與金九的結緣故事，但除了他們以外還立體地安排了諸多的人物、諸多的因緣。如：金九與褚輔成一家人的真摯的交往；金九與孫桂容；金九與陳國琛；金九與黑胡子等，金九在嘉興與許多普通的民眾打過交道。朴實忠厚的嘉興民眾熱情地接納了他，有些人為了保護他甚至拋出了自己的生命。又如啞巴子，他一直摯愛着朱愛寶，但一旦知道朱愛寶愛着金九，他使用生命來保護朱愛寶和金九，最後為了掩護金九，被日寇打死。作品的各個章節中都可以看到“緣”這個字眼，這個緣不只是指朱愛寶與金九的緣，有很多指金九與嘉興民眾的血濃於水的情分。這些因緣故事有的取自《白凡逸志》，有的選自作者的調查，有的來源於作者的想像。作者將他們立體地組合起來，構成一個整體的、活生生的歷史空間，在這個歷史空間中，朱愛寶與金九的結緣故事由淺入深，浸着眾多人的生命，浸着中韓人民的血與淚、理想與絕望、歡樂與痛苦，以一個整體性的歷史故事展現在讀者的面前，這部作品的敘述的真實就是這樣完成的。

二、《船月》的敘述特點

白話的韓人題材小說，從五四期間就陸續出現，郭沫若的《牧羊哀話》、蔣光慈的《鴨綠江上》、台靜農的《我的鄰居》等，以短篇小說居多。敘述方式有第一人稱敘述，多重敘述，傳聞式敘述等等。而長篇歷史小說《船月》採取了嶄新的敘述方法，用了章前“文外敘述”與第三者敘述，再加上結尾的作者補述，構成了一個多層的敘述空間。“文外敘述”就是以《漂在水上的日記》展示主人公的內心告白，同時用象徵的手法暗示每一章的內容。除了整體性的敘述構造外，筆者認為作者的童話式想像和描寫法是很值得注目的。可以舉幾個具體的例子。

(一)、算命鳥的描寫

作品中，算命鳥又叫“尖嘴鳥”，是第一章開首的《漂在水中的日記》中一位算命先生的鳥，它為朱愛寶叼出了一張紙牌。這鳥被描寫得很出奇：“小鳥轉了轉它的藍眼珠子，對我笑笑。真的，不騙你，笑得很神秘。然後，從攔在一邊的紙牌中銜出一張來遞給我。”算命鳥只在第一章里出現了一次，但在小姑娘愛寶的心里卻留下了一生難忘的記憶。算命鳥所起的作用就是要為朱愛寶日後與金九相逢結緣設下伏線，蒙上一層神秘的紗幕。作者用了擬人的手法描寫這個算命鳥，給它塗上神秘的色彩。這樣的描寫方法在迄今的韓人題材小說中很少見。但在從事了20多年兒童文學創作的夏輦生，卻是一個得心應手的事情。夏輦生是喜歡寫鳥的，我們翻開她的童話作品，比如《七個太陽》16)中那五彩六色的“太陽鳥”，那是太陽的孩子，也是太陽的使者。還有七彩的長尾鳥。這些鳥都是作者想像出來的，他們有一個特征，那就是他們都來自太陽，來自光明，為地球上的人們帶來歡喜、幸福。還有兒童科學幻想小說《着火的藍月亮》17)中的“乖乖嘴”，它是主人公——一個喜歡孵蛋的“怪博士”的助手“紅嘴八哥”。它幫助“怪博士”作各種孵化實驗，最後和“怪博士”一起飛到“夢的歌”城去。《船月》中的算命鳥無疑是基於作者的童話式想像而產生的。《漂在水中的日記》是一個虛擬的敘述空間，算命先生、算命鳥、印有船與月的紙牌，這些都是構成這個空間的重要因素，襯托出朱愛寶的命運。因為夏輦生作品中的鳥多是從地球外的世界飛來的使者，算命鳥的出現也就為《漂在水中的日記》帶來了美麗的意象、好奇的幻想、神秘的暗示。

在《船月》中，除了算命鳥外還有一處描寫了“鷓鴣”。第五章「腳印里開出的花朵」是全書中最美麗的一章，是朱愛寶與金九意識到彼此之間的緣分的最重要的一章。金九

在海鹽載青別墅避難的一天，他看到一群鳥在嘰嘰啾啾地歡叫，朱愛寶告訴他那是鷓鴣。金九想起韓國的“紅爪鳥”很像這個鷓鴣。於是“紅爪鳥”和鷓鴣便引起了保存在兩個人的記憶中的兩個夢境。朱愛寶的夢是：“夢見自己變成了鳥，飛到一片長滿山栗子的山坡上。”吃着那些熟透了的山栗子。她的夢境與金九母親的夢境很相像。金九的母親有一次夢見在一片長滿山栗樹的山坡上，找到了一只熟透的紅栗子，她把它珍藏起來，後來就懷上了金九。圍繞着“紅栗子”，朱愛寶與金九有這樣一段對話：

“我變成鳥，飛上山栗子樹的時候，看見那些咧着嘴笑的栗子有黃的，藍的，綠的，

還有紅的。對，有紅的！”

“哈哈哈哈哈……”金九開懷大笑。

“你笑什麼？”愛寶歪着腦袋問。

“我笑你現在又變成鳥了！”

“又變成鳥了？”愛寶被說胡塗了。

“沒錯。”金九站起身，走向窗邊，“一只美麗的鷓鴣！”18)

鷓鴣原本是地球上生存着的普通的鳥，但在《船月》中，作者把它寫進夢境——一種虛擬的敘述空間中，把朱愛寶與金九的心靈拉到一起。金九母親的夢是在《白凡逸志》中有記載的，但朱愛寶的夢却是作者的想像。兩個夢境的相關處就是鷓鴣與紅栗子。朱愛寶的敘述完全用了一種童話式描寫法，表現了她在她愛的男人面前的純真可愛。金九又因為愛寶的夢與自己母親的夢相近，對愛寶產生了親近憐愛的感情，把眼前的愛寶比做美麗的鷓鴣。在這裡鳥與夢構成了一個被淨化的封閉的空間，此刻，朱愛寶與金九忘掉了身邊的危險，沉浸在兩個心靈的純潔的交流之中。

夏輩生的鳥在啞巴子臨死前也出現過一次。啞巴子為了保護朱愛寶和金九被日寇打死，在臨死前看到朱愛寶和金九都在自己身旁，他笑了。作者這樣描寫他的笑：

啞巴子的笑聲，不是從嘴里發出來的，而是從眼睛里飛出來的，像無數只馱着陽光的鳥，她能聽到它們歡快的鳴叫。19)

這裏的鳥有如童話小說《七个太陽》中的太陽鳥，是光明和歡樂的使者，它起的作用就是將啞巴子的死淨化，提升到美麗的意境。

可見，《船月》中鳥的意象來源于作者的童話世界，起着一种升華，淨化，美化和神秘化的作用。爲作品帶來了丰富的想像空間。

(二)、藍色的用法

色彩的丰富也是夏輦生的一个寫作特点。在《船月》中最顯著的是藍色，全書中藍色的使用在30例以上。具体用例如下：

- ① 藍眼珠子算命鳥
- ② 朱愛寶的碎藍花布褂子
- ③ 鞋底的天藍色喇叭花
- ④ 藍花大碗酒祭李奉昌
- ⑤ 碎藍花布小包
- ⑥ 碎藍花布的棉門帘
- ⑦ 藍寶石
- ⑧ 湛藍的天宇
- ⑨ 碎藍花布做的小錢包
- ⑩ 士林藍長衫
- (11) 藍白相映的小碎花
- (12) 自由的藍天

藍色大多使用在与朱愛寶有關的地方，碎藍花樣的布料是她最喜歡的布料，褂子、門帘、小錢包，都用這個花樣的布料作，后來金九也喜歡朱愛寶的碎藍花布，討了她用剩下來布料，來抱他的自傳《白凡逸志》。值得注意的是①藍色与算命鳥的關聯，算命鳥的眼珠是藍色的。在前一項中我們已討論過算命鳥与夏輦生的童話創作的關係，當我們深入到她的童話作品中，就發現這位作者對於藍色持有獨特的見解和執着，如《藍色鐘聲的誘惑》²⁰《着火的藍月亮》《藍巴掌》²¹等童話小說都与藍色有關。科學幻想小說《着火的藍月亮》中，鑽入恐龍肚子的“怪博士”的眼睛是藍色的；恐龍們被“又圓又大的藍月亮”吸引着，匯集在藍月亮下；“蛋蛋龍”四處飛奔，終於找到了它的使命——銜

回一个藍寶石。藍月亮里封存着恐龍的“祖先尋求夏蘇的密碼”22)，也可以說是未來科學的密碼。小說中對藍色作了說明：“藍顏色，充滿幻想和智慧”23)。藍色在《着火的藍月亮》中，是与主題緊密關連的關鍵色彩。從這一點來看《船月》，作者給算命鳥添上一雙藍色的眼睛，也是爲了要給它涂上幻想、神秘和智慧的色彩。

在金九這一面，藍色意味着什么呢？⑦藍寶石，出現在金九的夢中。有一次金九生了病，病得很厲害，但經過朱愛寶不眠的看護，病情逐漸穩定下來，不知不覺沉睡在一个溫暖而美麗的夢里。他夢見“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那一天”，他組織的“光復軍”在闊步前進，夢里的天“藍極了，像洗過的藍寶石。太陽照在青翠蔥蘢的山坡上。山坡上開滿了成片成片的無窮花。”(24)這裡，藍寶石象征着光復時的天空，藍色表示着主人公的理想與向往。

⑧湛藍的天宇，出現在韓國國民黨成立的那一天。1935年10月下旬，韓國臨時議政院16名議員在嘉興南湖的一條游船上開了一次緊急會議，組成了韓國臨時政府第十三屆政府，組建了韓國國民黨。會議結束後，金九走上船頭，這時“一道騰空而起的彩虹高挂在金色的光波和湛藍的天宇相接之處！朱愛寶相信，這對於她和他，以及這滿船的人來說，都是一個好兆頭。！”25) 在這裡，藍色也象征着前進、成功、理想。

《船月》中的藍色基本上來源于作者的童話式想像，帶有神秘、理想、向往的意象。童話式想像和描寫在《船月》中起的作用，就是爲歷史小說的敘述空間增加了寬度和美感。這樣的手法在《船月》以前的韓人題材小說中是未曾有過的，可以說是在敘述手法上的創新。

三、作者与韩国的深层因缘

夏叢生對《虎步流亡》的敘述定位是：三通道時空交錯。三個通道是：一，有關金九流亡中領導抗日復國鬥爭的歷史故事；二，金九的儿子金信在半个世紀後來嘉興尋訪舊踪的記實性事件；三，作者因“韓國緣”而在文革期間經歷的家庭遭遇。即《虎步流亡》包容了三個歷史層次，一個是金九流亡中國的那一段歷史；一個是風雲動亂的文革時代；一個是90年代中韓建交前后的時代。金九流亡中國的舊踪調查始於金信的來訪，

而金信的來訪得以實現則在于時代的變化。建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韓國是一個在政治上被否認和回避的對象，很多中國人知道北朝鮮却不知道韓國。但進入80年代，大陸的改革開放促進了大陸與海外各國的交流，中韓之間開始了民間範圍的經濟交流。到了90年代，中韓兩國正式建交，為兩國的各项交流敞開了大門。這樣的時代變化為金九舊踪的調查提供了可能性。

我們在《船月》的「作者補述」和「后記」中已大略知道金九流亡中國的那一段歷史的挖掘源于金九的儿子金信的多次尋訪。讀了《虎步流亡》，才了解了金信尋訪的全部過程。夏輦生本來是《嘉興日報》的記者，因為她的姐夫是韓國人，她受姐夫之托，接待并陪同金信尋訪金九舊踪，通過十年的尋訪，終於把金九流亡的史實從塵封已久的歷史中挖掘出來。

有關金九流亡中國的歷史的線索是很稀少的，只靠《白凡逸志》和金信的一些斷片性的記憶，調查中困難是很大的。但夏輦生不折不撓，發揮她做為記者的敏感與堅韌，終於找到了《白凡逸志》中記述的有關金九在嘉興避難的具体地点，如：金九主要避難地点梅湾街76号，陳桐生的家；褚輔成的宅院；海鹽的載青別墅；還有韓國臨時政府要員居住過的日暉橋17号石庫門大院等。在人物方面的調查中，夏輦生找到了褚輔成的后代，陳國琛等，了解到有關褚輔成與金九的往事；發現了孫永宝的儿子孫桂容，從孫桂容的回憶中得知了金九從上海秘密運到嘉興的一箱炸彈，和孫永宝一家為保護這箱炸彈盡力的一番周折。夏輦生的調查成果為証實和彌補金九流亡中國的歷史作出了很大貢獻，在20世紀中韓交流史中，《虎步流亡》所具有的史料性价值是不能否認的。

《船月》與《虎步流亡》雖然是不同形式的作品，但實際上是表里相襯的兩部作品，《船月》以寫朱愛宝與金九的結緣故事為主，描寫出一個慘烈而壯美的悲劇。《虎步流亡》則以記述金九的避難生活為主，塑造了獨立運動家金九的形象。其中很多地方記述了作者對各个歷史事件的感触和感動，因此，《虎步流亡》還可以說是《船月》的題材寶庫，為我們理解作者的對韓認識、對韓感情，提供了重要的根据。也為我們探討《船月》的描寫與作者內心世界的關連提供了有意義的線索。

(一)、 因緣的連鎖

《船月》與《虎步流亡》有一個共同點，即對“緣分”的強調。當我們讀《船月》時，

就感覺到歷史上衆多人物的因緣的分量；當讀到「后記」時，第一句話就是：“寫完這部書稿以後，我恍然頓悟：世界上許多因緣天定的事情，往往是無法拒絕的。”接下去便是一連串“緣分”迎面襲來，從「后記」中我們知道作者的姐夫是韓國人，他的父親與金九有過關係；我們又知道後來她姐夫一家回韓國去了；我們還知道作者受了姐夫的委托，幫助金九的兒子金信調查當年金九在嘉興的生活，等等。作者把它們稱為“不容拒絕的緣分”。然而，我們在「后記」里很難摸索到這些“不容拒絕的緣分”是怎樣串聯在一起的，在作者的內心世界發生了怎樣的作用。我們要重新提問：作者的人生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件？她再三強調的緣分與她長達十年的調查，與《船月》寫作動機到底有什麼內在的關係？

抱着這樣的問題，我們打開《虎步流亡》，在開首部分又是作者向“緣分”提出的問話：

命運是什麼？我常常會問。

問過了大半輩子，還是一個沒有解開的謎。

我又問，什麼叫緣分？似乎也沒有誰能說得清楚。26)

《船月》的緣分只限在作品人物之間，但《虎步流亡》中的緣分却是作者自己的問題了。作者問了半輩子的問題始於文革的動蕩期。文革初期，她的姐夫突然以“朝鮮特務”的嫌疑，受到逮捕的通緝令。她的父母因此也受到牽連，被戴上“特務”的帽子，關進“牛棚”。她的父親在“牛棚”里受盡毒打，致使他完全絕望，在一天夜里用斧頭自殺了。經搶救雖然未至喪命，但那以後成了臥床不起的身體。當時夏輦生被通知去洗被鮮血染透了的被子和床單，年輕的作者受到了莫大的精神打擊，作者說那是一個“血的沖擊”。在《虎步流亡》中，作者回憶了父親自殺前說過的話：“唉，說不清楚了。什麼都說不清楚了。”還沉痛地寫道：“確實，他說不清楚。那是個說你什麼就是什麼的瘋狂時代，他說不清楚他女婿是不是特務，也說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特務。確切地講，他連說的權利都沒有。”27)文革結束時，作者的父親和姐夫都被平反了，但她的父母已是身心上創傷累累，無法醫治。而且那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姐夫的“朝鮮特務”之謎依然留在他們的心里，難以解開。直到80年代中期，作者才知道姐夫的身世，但那時她的父親已不在人世了。

《虎步流亡》的三个歷史層次中，中間的一層即文革時代，就是作者經歷的“血的沖擊”的時代。在种种沖擊中，她開始思考：姐夫是什麼人？韓國是怎樣的國家？中國和韓國究竟有過怎樣的交往？對中國與韓國的緣分的提問，對自己與韓國的緣分的提問，對文革的反思，這些都促使她在90年代，以渾身的力量和熱情投入于尋訪金九舊跡的工作。我們可以說，促使她將90年代與金九流亡中國的30年代連接起來的原動力就來源于文革那段“血的沖擊”的歷史。她對金九的理解和感動也基于文革期間的种种體驗。所以，不理解她的遭遇和痛苦，也就不能理解韓人題材三部作品的創作動機。“歷史的回音，是需要用心去聆聽的”，這是夏輦生的信條。能用心聽，就必須先用心去問。文革時期的體驗使她開始用心向歷史提出疑問，用心去聽歷史的回答，聽金九的回答。

我們從《虎步流亡》了解到了作者的經歷，才明了了《船月》「后記」中她說的种种“不容拒絕的緣分”的意思。文革期間造成作者一家深受創傷的原因在于姐夫與韓國的關係。姐夫之所以在中國，是由于他父親和叔叔跟隨金九在中國從事獨立運動。這本來是抗戰時期中韓人民同命運共患難的，值得記憶的歷史。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陣營上呈現出東西冷戰的狀態，韓國戰爭后，韓半島也被南北分斷。半个多世紀以來，中國與韓國一直隔絕，意識上不能相互認同。中韓兩國人民相濡以沫的歷史被无情地封閉起來。在文革期間，一提到“韓國”，就會立刻喚起“間諜”“里通外國”“特務”等疑念。夏輦生在文革以后很長一段時期，一直不能解開她的疑問。“「朝鮮特務」之謎，依然存留在我心底的疑惑中難以解開。”28) 這句話告訴我們，她一直在向這個事件提出質疑，向歷史提出質疑。她的疑問經過十年的尋訪調查工作，終於得到了解答。如E·H·卡所說的那樣，她“意識地卷入了歷史，并主体性地為歷史起了作用”。

在《虎步流亡》中，作者面對自己打撈起來的歷史，意味深長地感慨道：“在今天回憶這些往事時，許多人都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每當打開這段塵封的歷史，這些人却都活生生地活在眼前。一方面是一批前仆后继、以身許國的韓國仁人志士；另一方面是一些平凡善良和默默無聞的普通中國人民。他們偶爾相遇，相識，進而相互理解以至相濡以沫。這不能說，這跟我們的國土相依相接沒有關係！就象在韓文中至今還有許多漢字一樣，有着它必然的因緣和源頭。”29) 因為夏輦生意識地卷入了歷史，那些被人忘却的歷史便活生生地在她眼前展現開來，歷史中的种种因緣也都有機地串聯在一起。因緣由人与人的範圍擴展到國與國，文化與文化的範圍。《船月》中的世界不正是這樣的嗎？！金九、李奉昌、尹奉吉都是不怕死的仁人志士；啞巴子、孫桂容、朱愛寶也都是平

凡善良的中國人，他們能理解志士仁人的胸怀，愿意“好人帮好人”，甚至爲了保護他們犧牲自己的生命。鷓鴣与紅爪鳥、杜鵑花与无窮花，又是用了象征的手法表現國家之間、文化之間、民族之間的因緣關係。

(二)、金九的愿望与悲哀

金九在《白凡逸志》的最后聲明了他的愿望：

如果上帝問我的愿望是什么的話，我將毫不猶豫地回答：

我的愿望，是大韓的獨立。

如果再問我下一个愿望是什么時，我的回答還是：

我國的獨立。

即使第三次問我其他的愿望，我也大聲回答：

我的愿望是我大韓的完全自主獨立。……30)

金九的愿望是韓國的獨立，他所說的“完全自主獨立”的真意最終在于韓半島脫離美蘇兩大強國的支配，以一個整體獲得獨立。這表示了他對祖國的赤誠至愛。但他的愿望並沒有完全實現，他爲了韓國的統一，爲了使韓半島擺脫美國和蘇聯的控制，曾奔波于38度線南北，促成了南北協商會議和祖國統一民主主義戰線的實現。但就在祖國統一民主主義戰線結成的第二天，他被政治暴徒安斗熙暗殺了。而且他的愿望至今仍未得以實現。

金九的這一段以身許國、傾吐忠誠的話，在《船月》和《虎步流亡》中都能看到，但《船月》沒有詳細地描寫金九被暗殺的事件，重點描寫爲他的死而悲痛的朱愛寶。《虎步流亡》中却有較大篇幅的敘述。在作品結尾部分作者敘述了金九的死，并加上作者的感触。作者想像着金九的國民葬的情景，感慨萬分地寫道：

在一片悲慟的哀泣聲中，金九先生按照他与李奉昌、尹奉吉的生前所約，朝着孝昌公園的墓地走去。唯一讓義士們吃驚的是，這位无所畏懼的偉人臉上流滿了泪水……

那泪水，是從他心底流淌而出的最深重的悲哀！

爲他終於沒能實現的南北統一的大愿。也爲他終因倒在同胞的槍下而無法去禮拜自己的母親。不知見到母親的時候，她會不會重復当年她在南湖時說話的口气，這麼說：“遺憾的是安斗熙也是韓人。倒不如是中了日本人的槍彈好！”臉上的表情，一定無限悲哀與遺憾！31)

作者對金九的死所抱的感慨是大愿未果的悲哀和死于同胞之手的悲哀。作者把自己所感到的悲哀寫進金九的心里，讓金九與他母親在九泉之下對話，共叙他們的遺憾與悲哀。作者這樣寫，不是沒有根據的。《白凡逸志》中，有金九在1938年5月曾遭韓人李云漢暗殺的記述，槍彈直射到心臟附近，却沒有死掉。那時他母親對他說：“我知道上帝會保佑你的，邪不犯正嘛！讓人遺憾的是李云漢也是韓人，倒不如是中了日本人的槍彈好！”32)金九並沒有清楚地說明她母親的心情是否是悲哀的。但作者從金九母親的話中敏感地體察到他們的心情。爲了韓國的獨立，不顧自己的生命，英勇奮鬥的仁人志士會遭到這樣的毒手，這不僅是金九和他母親的遺憾與悲哀，還是大韓民族的遺憾與悲哀。實際上這正是作者從《白凡逸志》中發現的金九和他母親的“心靈的表現”，作者把這個“心靈的表現”——遺憾與悲哀，寫進了《虎步流亡》，也寫進了《船月》。《船月》第十章「月亮碎了」中描寫了李云漢暗殺金九的事件，讓金九母親道出了她的遺憾，同時這樣寫道：

他領會母親說這話的悲哀情緒。

一个被日寇重金懸賞緝拿却未被傷着一根毫毛的韓國抗日領袖，竟然倒在自己同胞的槍下！這也正是他心底最深的悲哀。33)

這裡，遺憾與悲哀已表現出來。《船月》的結尾主要以寫朱愛寶的悲哀，她與金九結緣的悲壯美麗的結局爲目的，故沒有從韓國和作者的方面描寫金九的死。但作者對暗殺金九所觸發的感懷在這裡已以通過金九和他母親表現出來，與《虎步流亡》中傾吐的情緒是一致的。

四, 《船月》的对韩认识与意义

中國的韓人題材小說,從五四時期到現今,貫穿其中的對韓認識的主流,始終是對韓國被殖民地化的同情和對韓國獨立的希望。各个不同時代又加進中國人的時代感。如:從五四到建國時代,表現以韓半島為反面或正面的鏡子,憂國憂民,從而激勵民心,奮起反抗;在韓國戰爭時代,則表現為援助朝鮮,保衛祖國的國際主義精神。到20世紀末期,中國則通過了一個動蕩的時代——文革時期,和轉折的時代——改革開放時期,作家們的對韓認識也必然帶上動蕩和轉折的色彩。另一方面,做為被認識的對象,韓半島南北分斷的現實也為中國作家提出了新的、夏雜的課題。

《船月》的作者正是在文革的動蕩中渡過了她的青年時代,她与她的家族經受的遭遇,在她的心灵中留下了難以泯沒的傷痕。她對文革的反思、疑問,是付出了痛苦、流血、犧牲的代價的。但又正是這個文革的遭遇給了她一個反顧歷史的契機。在她那里,對韓國的認識跨越了大半個世紀,從文革時期的經歷,開始了長期不解的疑問,接上90年代中韓建交,彼此來往的新時代,通過幫助金信尋訪,才得到揭示30年代金九流亡中國的那一段歷史的機緣。正象夏輦生在《虎步流亡》「后記」中說的那樣:“很多時候,寫書便是將這些昨天的故事浸泡在今天的水中,顯現出歷史的花紋來,迎候着明天太陽的照耀。”她的《船月》正是將半個多世紀以前金九在嘉興的故事浸泡在今天的水中,浸泡在中韓兩國人民的來往交流中,浸泡在作者的辛苦尋訪和丰富着實的想像中,顯示出來的歷史的花紋。在這個浸泡的過程中,作者主体性地、意識地進入了歷史、摸索到了歷史的脈搏。

《船月》中作者的對韓認識的基点是李奉昌「東京炸案」和尹奉吉「虹口公園炸案」。作品中第1、2、5、7、9、10章中都可以看到對這兩個事件的描寫,對李奉昌、尹奉吉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作者對他們以身許國,為了爭取民族獨立不怕犧牲的精神和行為的感動。作者的感動分散在小說中許多人物的言行上,從不同的角度表現出來。

從金九的角度看,李、尹二人的炸案都是受了金九的指示實行的,可以說李、尹二人的行動代表了金九的意志。金九的逃亡發生在“虹口公園炸案”之后,在逃亡過程中他對李、尹二人的緬懷和《屠倭實記》34)的完成都反映着他對李、尹的高度評介和對獨立、

抗日的堅強信念。作者在第五章中引用了《屠倭實記》的几行文字：

吾韓華二同志其勿以日人之堅甲利兵爲惧，東京、虹口兩炸案既足破此扰憂，則以吾血肉以吾精誠奮勇直前，夏何畏何惧哉？嗚呼大勢亟矣，使不幸中華而受制于日，則其所受之慘毒艱苦必十百于昔之滿清，而其夏興之難亦必十百于辛亥之役，吾韓更有万劫不夏之痛矣！故如吾韓計夏韓國，必先救中華，爲中華計夏韓國亦以救中華。此鄙人所以喑口哀音，以望吾華韓兩同志之共醒以期共命于戰場也！35)

在此，金九以東京、虹口兩炸案爲例，揭示了列強不足畏，靠着不折不撓的奮鬥，弱小民族一定能爭得解放的可能性。他把李奉昌和尹奉吉的形象提高到不僅是韓國爭取獨立的英雄，而且還是喚起中國人民振起，與韓國人民攜手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榜樣的高度。金九把韓國和中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把中國視爲同志。他的這几行文字意在呼吁中國人民覺醒，中韓二同志合力“救中華”、“夏韓國”。作者夏輦生引用這几行文字的用意也正在此，她對金九的共鳴在于她和金九一樣，沒有把李、尹二人的行爲限制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民族主義範圍內，而是把他們擴展到中國，擴展到被侵略被殖民統治的弱小民族，既國際主義的範圍去認識，去評價，關注中韓兩國共同抗爭的具体行動和具体的交流。我們在圍繞金九與李、尹二人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對韓國獨立運動者的認同與評介。作者以1932年初夏，既“虹口公園炸案”爲《船月》的開端，以李、尹兩義士的故事爲貫穿全篇的一條經線，就是爲了要描寫出在日本殖民統治與侵略之下，中韓兩國所面臨的共同的命運，描寫出中韓兩國人民共同抗日的歷史。

從作品中的中國人物來看，這里包含了几個階層，首先是褚輔成，他是一個先進知識分子、愛國民主人士。青年時代留學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有丰富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的經驗。從他的經驗與社會身分來看，可以說與金九是同等水平的。在金九逃難期間，褚輔成是金九的掩護者和後援者。在當時掩護一個被日軍用60萬大洋懸賞緝拿的人物是要冒毀命的危險的。當褚輔成被兒子質問：“置全家人的性命于不顧，收留這個被日寇懸賞緝拿的韓國人，你到底圖的是什麼？”時，他堅定地回答說他什麼都不圖，只圖一個“義”，一個“正義”。還說：“倘若，僅是江湖之義，自然有義無德。若是義在國家，義在同志，義在千秋偉業，那麼，此義足以仰歌千古！”36) 褚輔成的回答中包含了他對金九的認同與評價。作者說他們是“因緣相聚，志同道合”。

37)他們的志與道便是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褚輔成感佩金九的一個具體事例就是李、尹二義士的英勇行爲。他對金九說：“自從1月8日李奉昌義士在東京暗殺日本天皇，到‘4·29’尹奉吉在虹口公園搞的大爆炸，你這個‘張震球’干出的舉世震驚的大事還算少嗎？”38)他還說：“虹口公園那聲爆炸聲，解了咱中國人多少恨？就冲着這一點，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理應全力相助。”39)他對李、尹二義士的評介與金九一樣，也是從抗日救國的角度予以贊揚和認同的。

嘉興的女教師楊柳也是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她在課堂上教育學生們認清中國被日本侵略的現狀，宣傳抗日思想。她談到“虹口公園炸案”，興奮地說：“就是韓國義士尹奉昌向檢閱台投擲了炸彈，當場炸死炸傷了日寇的好多要員，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真是大快人心！”40)這里也表現了中國人民對韓國義士的贊揚。

與褚輔成、楊柳這樣的愛國知識分子相比，朱愛寶、啞巴子、孫桂榮對金九所抱的則是勞動大眾的樸實淳厚的感情。本論文第一節中已論及到促進朱愛寶與金九之間感情深化的重要因素是李、尹二義士的故事。朱愛寶跟金九學習識字，不久她從金九那里知道了李奉昌、尹奉吉的故事，朱愛寶從兩位義士的名字里發現了一個相同的字，就是“奉”，奉獻的奉！金九教朱愛寶識字的時候，曾告訴她“別小看這麼一個字，那可是一顆赤誠的心啊！”“是一顆爲國家，爲民族，無私無畏徹底奉獻的心！”41)這時她理解了這個“奉”字的分量。她理解了李、尹二義士的赤誠之心，也理解了金九的赤誠之心。所以在金九爲義士祭祀的時候，她也悄悄地爲義士們植上了一簇杜鵑花。朱愛寶開始接觸到金九的心灵世界，對金九奉獻之心的理解與感動，堅固了她對金九的信賴。作品中作者把杜鵑花與韓國的無窮花相對等，用以連接朱愛寶與金九的感情，這實際上是用了一個美的象征物，象征了中韓兩國人民的認同、連帶意識。

朱愛寶說：“好人幫好人，是天經地義的事。”42) 這個不識字的船娘以這樣淳樸的語言表達了自己對金九的感情。這樣的感情在啞巴子也是同樣的。他對金九也抱着“他是好人！那些壞蛋要抓的都是好人！”43)的想法。對日寇和漢奸的仇恨把啞巴子的心與一個韓國愛國者連接在一起。他兩次保護了金九，最後爲了救金九被日寇打死。

褚輔成、楊柳、朱愛寶、啞巴子、孫桂榮還有其他人物，他們對金九所表示的態度實際上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作者的對韓認識。從愛國英雄到知識分子再到勞動大眾，表示了多層次的認同。金九與中國人民結下的血濃于水的情誼使作者清楚地看到中韓兩國人民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有着很深的緣分。《船月》的目的就在于通過金九與朱愛寶

結情的故事，通過金九在嘉興經歷的其他故事，表現出中韓兩國人民血濃于水的情誼和緣分。與五四時期的韓人題材作品相比，《船月》明顯地實現了一次大幅度的深化。第一，五四時期的作品雖已有對韓半島的負面或正面的認識，但着重強調的多是亡國的悲哀，（其原因自然是因為時代的關係）。而90年代的《船月》則注重韓國人民的反抗，全面強調韓國做為中國的正面鏡子的意義。第二，如果說五四時期的作品多以傳聞、報刊為描寫韓半島的題材和題材來源，表現中國人的同情和自省。那麼《船月》則是以中韓兩國人民共同抵抗、生死以共的歷史故事為題材，表現了兩國人民志同道合，“血濃于水”的情誼。中國人不再是韓國的旁觀者，而是他們的同志。

作者對金九的願望與悲哀的認識反映了她自己對韓半島的願望。東西冷戰、韓半島的南北分斷、中國與韓國的隔絕，這些過去的經歷，對中韓兩國來說，對韓半島南北人民來說，都是造成不幸的根源。作者以文革時期的親身經歷痛感除却這些不幸的根源的必要。所以金九的願望——大韓的完全自主的獨立——也就變成了作者的願望。《船月》可以說是夏聳生繼金九之後，為實現他們的願望所作出的一个努力。

《船月》以作者對歷史的主體性的迫近，突破了對韓認識的禁區，勾通了半个多世紀以來中國與韓國之間的隔絕，為我們揭開了長期以來被忘却的歷史。《船月》中呈現出的對韓認識，在某種意義和程度上，澄清了長期以來中國對南韓的誤解和疑惑，為我們展開了重新認識中韓關係的視野。在敘述方面作者以她所擅長的兒童文學的手法，為歷史小說增添了色彩，提示了敘述的可能性。在20世紀與21世紀相接交的時刻，《船月》以它跨越時代的幅度，對韓認識與對韓感情的深度，作品構思與敘述手法的堅實性、新穎性，為當代韓人題材小說樹立了一个嶄新的標識。

参考书目

- | | | |
|--|-----------------------------------|-------|
| 夏輦生 《船月》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1999年 |
| 夏輦生 《虎步流亡》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1999年 |
| 夏輦生 《回歸天堂》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2002年 |
| 夏輦生 《着火的藍月亮》 | 少年儿童出版社 | 1999年 |
| 夏輦生 《七个太陽》 |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1999年 |
| 夏輦生 《藍色鐘聲的誘惑》 |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 1992年 |
| 夏輦生 《藍巴掌》 |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 1992年 |
| 金九 《白凡逸志》 | 平凡社 | 1975年 |
| 金九 《屠倭實記》 | 《白凡金九全集》所收 | 1999年 |
| 朝鮮史研究會 《朝鮮的歷史》 | 三省堂 | 1988年 |
| 孫忠武 《暗殺》 | 晴文社 | 1972年 |
| 《PLUTARCH LIVES》 | Plutarch HARVARD UNIVERSLTY PRESS | 1967年 |
| Donald Spence 《Narrative Truth and Historical Truth》 | W·W·Norton and Co | 1982年 |
| E·H·Carr 《歷史是什麼》 | 岩波新書 清水几太郎譯 | 1999年 |
| 趙白生 《傳記文學理論》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2003年 |
| 尾崎秀樹 《歷史文學論》 | 勁草書房 | 1976年 |

Abstract

The Method of Descrip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to Korea in “Chuanyue”

Rina Fujita

“Chuanyue” is a historical story of lov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people, which was written by a Chinese author in the late 90's. The story is set in Shanghai and Jiaxing in 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Korea and China in 1930's. The story of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gitator Kimkoo, his friendship with the people of Jiaxing and his love of a female boat worker Zhu Aibao, tell us a beautiful and impressiv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The author Xia Niansheng 's intention is to evoke the history people have long forgotten.

Since the cold war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has ended. Korea has become an enemy of China and an object of suspicion. That's wh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60's and 70's a number of Korean residents and Chinese who were mixed up with them were persecuted on false charges. The family of the author Xia Niansheng had those kind of experiences and were hurt in mind and body. She began a 10 yea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xchange history between Kimkoo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Chinese people's recognition of Korea, because she regrett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investigation, she had revealed Kimkoo's refugee life in Shanghai and Jiaxing, and the history of a revolutionary.

The author described Kimkoo's refugee life using a lot of sources and data, and rich imagination, as well as the tragic love story between Kimkoo and Zhu Aibao. “Chuanyue” revealed the true history which had been concealed and, afte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China and Korea, opened up a new hope for the future

recognition of this history and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both countries. The work is one of the best Korean theme novels.

Key words : Destiny. Boat and Moon.